

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国家比较优势基础

王炳才

(天津商学院 300134)

内容提要 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不能孤立于国家的比较优势,它必然要反映出比较优势的成长。19世纪的英国的工业巨头是纺织业和钢铁厂的老板,因为那时纺织业是英国在世界上的比较优势企业,因为那时英国首先发展了钢铁冶炼业。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纺织企业不再风光,因为伴随着寿命周期的演进,纺织业已成为其夕阳工业。中国改革开放后最耀眼的企业家巨星是鲁冠球、张瑞敏等,而首钢和一汽虽说也对中国的发展作用重大,但知道他们老总名字的人数就少得多了,事实上,中国的纺织服装和机电产品出口创汇分列第二和第一位,相关的企业具有强烈的自生能力,而首钢和一汽等主要依赖于国家的资金和政策供给,这些重工业企业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和企业家敏感地接受基于国家和比较优势结构的市场价格信号,在要素市场上购买价格低廉的丰饶要素组织生产和营销,在产品市场上出卖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产品获取利润,其国内和国际市场份额都将提高,企业和企业家都将茁壮成长。

关键词 企业 企业家 比较优势

T27 A

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不能孤立于国家的比较优势,它必然要反映出比较优势的成长,它必须要顺应比较优势的成长。影响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因素包括许多方面,但不能顺利地从事国家的比较优势行业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之中,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向作用更加凸现。“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而比较优势法则就是价值规律在国际经济领域和区域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发挥比较优势可以有助于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增进国民福利;可以有助于企业实现最低收入,增加盈利;可以降低企业筹资成本,避免引发金融危机。而为了使企业涉足于国家的比较优势行业,政府应排除相应的干扰因素,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影响因素

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罗列出许多,但大多属于外在的或由外在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抑制了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本来,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企业和企业家的目标是盈利,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为了利己的盈利目标,企业家必须采取合理的决策和理性的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较大化。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要想理解这个自然的过程,只需简单回顾一下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近代企业如何萌芽于固步自封的封建社会,只需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后作为新生力量的乡镇企业如何异军突起、星火燎原,这是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典型案例和经典教材。

第一,所有制基础。私营企业注定要为自己的盈利或亏损负责,它必须在硬预算约束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它必然以利润目标为基础决定任免、解雇或增雇。合资企业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必然在利润目标前提下通过出资方或经营者的博弈作出决策,决定投资或生产方向,决定人事任免等事宜。国营企业由于软预算约束、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实际上不以盈利为目标甚至产生亏损,而一个经常亏损或只

获微利的企业的成长则注定要困难重重(林毅林、蔡昉、李周,1997)。乡镇企业属于自负盈亏的集体组织,它面对的是绝对的硬预算约束,如果长期亏损,乡镇企业就要倒闭;当乡镇企业经营不善时,它可以很容易地解雇其低效率的员工。因此,乡镇企业在追求利润时,其方式是合理的,其效率是较高的,甚至与私有企业相比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塚启二郎、刘树强、村上直树,2000)。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税收、产值、就业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乡镇企业在很少得到国家支持的前提下提供了约占1/3的税收收入,乡镇企业吸收的就业人口中,绝大部分属于中国的低收入阶层,因而乡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的经济福利意义。

第二,经济体制环境。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这成为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桎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没有企业家,而只有车间主任,没有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而只有作为加工单位、作为政府政策目标实现终端的介于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特殊组织。改革开放冲淡了企业的政府职能,减少了计划目标,造就了一大批懂市场规律、会组织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家。

第三,国家比较优势基础。如果企业和企业家涉足于其国家的比较优势行业,那么企业就容易实现最低成本的投入,容易盈利,具有自生能力,容易克服可能的困难和障碍。如果企业和企业家涉足于比较劣势行业,那么除非有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否则是难以获得发展的。19世纪英国的工业巨头是纺织业和钢铁厂的老板,因为那时纺织业是英国在世界上的比较优势行业,因为那时英国首先发展了钢铁冶炼业。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纺织企业不再风光,因为伴随着寿命周期的演进,纺织业已成为其夕阳工业。中国改革开放后最耀眼的企业家巨星是鲁冠球、张瑞敏等,而首钢和一汽虽说也对中国的发展作用重大,但知道他们老总名字的人数就少得多了。事实上,中国的纺织服装和机电产品出口创汇分列第二和第一,相关的企业具有强烈的自生能力,而首钢和一汽等主要依赖于国家的资金和政策供给,这些重工企业并不具有比较优势。

第四,企业家素质。企业家素质可以表现为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但企业家素质的本质还不在于此,企业家素质的高低在于能否最大程度地规避针对其盈利和市场份额的干扰,这些干扰可能来自于违背理性的所有制形式和不适宜的经济体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的特定经济发展战略。更重要地,企业家素质的高低还在于能否及时准确地把握国家的比较优势及其演化。投资于比较优势行业的企业犹如顺水之舟,相对更容易抵达盈利的彼岸,这样的企业家具有较高的作为企业家的素质。

二、企业和企业家成长与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某行业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它可能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相对为高,也可能归结为某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饶。我们可以用市场占有率、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考察特定行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当一个国家发挥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时,该国在劳动生产率相对为高或成本相对低廉的基础上进行了生产,在投入既定的前提下,产出水平会提高,如果按照居中的价格与它国进行交易,则双方都会因为间接生产的实现而提高国民福利水平,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合理配置。由于国际交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的差异,而非绝对优势的差异,因而国际交易的基础是宽厚的,即使某些国家总体上相当落后,它们仍然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从事有利可图的分工和贸易。

一个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能够影响该国国内的发展格局,即,从事该国比较优势行业的地区或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好,容易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或避免落后,而背离本国比较优势格局的地区或企业则往往困难重重,经济领先的可能性往往更小,因为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大环境决定和影响小环境,世界经济格局决定和影响国内区际竞争格局(王炳才,2001)。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矿产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1992年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别为0.47、0.45和4.07(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说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资本和矿产密集型产品则呈现出明显的比较劣势,大力度大规模的发展往往是不经济的,往往不易取得预想的效果。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1997年霍夫曼比例分别为1.04、0.70和0.78,高于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的0.33、0.41、0.62和0.19,

表明了三省较高的轻工业比重和相应的更大的比较优势(王炳才,2000)。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事实上在更大的程度上发展了中国的比较优势行业,因而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三省1978年至1996年相对经济发展速度分别为1.85、1.26和1.36,高于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的0.78、0.56、0.70和0.74(周民良,2000)。

就企业发展的层面来说,比较优势法则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从理论上讲,企业一般是产品价格的接受者,因而其利润的多寡就主要取决于成本的高低。在一个劳动丰饶而资本稀缺的国家,劳动的价格是低廉的而资本的使用代价是高昂的。企业家天然具有趋利避害的禀性,在资本稀缺的国家,企业家的投资预算约束更大,更会倾向于购买廉价的生产要素,而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即是企业家的自私和理性禀性的实现,更是劳动丰饶和资本稀缺之国的外在客观要求。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企业家自然会主要从事于该国的比较优势行业;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着很多的管制和干预,或者执行着不适宜的发展战略,那么该国从事于比较劣势行业的企业往往运营不佳,或者,在管制和干预无法触及的地方,企业仍然会从事该国的比较优势行业,并且仍然会实现相对更好的盈利,——中国的乡镇企业就是走过了这样的历程。青岛的海尔是我国的知名企业,它实现了近20年年均约80%的快速增长。海尔涉足的领域是电冰箱和电视机等家电行业,该行业产品属于典型的标准化产品,竞争优势已主要取决于劳动成本的低廉,而非研究与开发和丰饶的资本,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劳动禀赋往往是丰富的,因此家电总体上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行业,是中国的优势行业。海尔的成功可以归结为多种因素,但从事了中国的比较优势行业却是根源性、基础性的原因。中国的电冰箱、电视、微波炉等出口很多,但汽车的出口就逊色多了,这就说明了比较优势的差异。

三、与比较优势相关的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障碍

与比较优势相关联的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障碍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上不适宜的发展战略。经济上不适宜的赶超式发展战略无助于后进经济的腾飞,因为它制约了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济上不适宜的发展战略常常表现为脱离本国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而祈求实际上缺乏基础的本质的跳跃,即,实现产业结构的显著性的本质的升级。这种跳跃往往不能实现,因为对比较优势的背离无助于企业家实现最低成本的生产,无助于企业家在货币市场上筹资,无助于企业家赢得利润和占领市场。中国在5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经济和军事封锁时被迫地实施了旨在填补工业空白和强化军事装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当时中国是个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国家,资本贫乏而劳动力相对更加丰富,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行业因需巨额投资而难以发展。当时,在农村不合时宜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动员能力,最大限度地吸收经济剩余;在城市通过对工人基本生活条件的几乎无偿提供力图降低生产成本。在这种赶超战略下,为避免贪污等腐败行为,在全国建立起了指令性生产计划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务体制,重工业企业领导人被剥夺了自主经营权;为了取得轻工业剩余的支配权,使之最大限度地用于符合国家意图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将私营企业改造成国有制企业(林毅林、蔡昉、李周,1999)。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企业存在范围大为减少,企业家变成了车间主任和政策执行终端,而且企业的国有化程度越高,其政府政策职能越强。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进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虽然未被放弃,但指令性生产计划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务体制被放弃,各方面的经济歧视和限制也大为减少,这都在客观上方便了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

第二,舆论上的误导。现实中经常充斥了一些表面上很有道理而实际上错误的观点,如,有人说,民营企业素质普遍不高等等。我们知道,企业素质的高低主要应该看它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趋势,主要应看它是否具有自生能力。装备状况等虽然重要,但仍然属于外在的表现。民营企业在得不到支持甚至遭受歧视的情况下能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充分说明了其体现出国家比较优势基础的强烈的自生能力。民营企业是真正的企业,民营企业家是真正的企业家。如果没有针对民营企业设置的进入障碍、歧视性

待遇和可怜的定位(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民营企业将更好地支撑起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有一种典型的错误口号,叫做跨越式发展。在政府对企业可以施加其意愿的影响的地方,对所谓“跨越式发展”的学习或对员工实施的相应教育会极大地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营,提高经营成本,甚至形成超越其实际所处阶段的投资决策。其实,任何经济的发展都是渐进的,钱是一元一元地赚来的,或者是一亿元一亿元地赚来的。

第三,理论上的难圆其说、观念上的错觉和行动上的无功而返。许多人往往发现中国从事的是初级产品的生产或低附加值工业产品的加工,而发达国家则主要生产并出口工业产品甚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尖的工业产品,因而认为如果通过政府的扶助使在中国新建的现代大工业走向成熟,则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领先于发达国家,但这在理论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支持会引发系统性的困难,如背离比较优势、增加筹资困难、导致财政困难、引发道德风险、引发官员的寻租、引发金融风险等。理论上都不能证明的东西,在现实中往往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有许多国家在二战后实施了旨在实现工业化的进口替代,但收效很差,而那些执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国家则成长为实实在在的工业发达国家,因为随着其劳动密集型产业^①的发展,该国的资本禀赋比重会渐渐上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该国便演变成为资本丰饶之国,因而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具有了比较优势。有些国家虽然也曾对国内新兴工业进行过扶持,其新兴工业也确实成长为支柱工业,但认为对劣势项目的扶持导致了劣势项目转化成为优势项目实在是一种错觉,真实的情况是,对密集使用丰饶要素的比较优势产品的专注容易实现最低投入的生产,容易盈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资本(或研究与开发等)禀赋比重显著提高,致使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期间同时伴随着政府的政策支持。如果一意孤行致力于本国的比较劣势行业(同时是世界先进产业),那么,到头来只能是无功而返。上述讨论与企业家成长有什么关系呢?对世界范围内先进或相对先进而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的执着误导了资源配置,向企业家发出了虚假的经济信号。有时作出正确判断的企业家对本国比较优势部门的涉足也会受到限制,甚至被制裁,这都制约了企业和企业家的健康成长。

四、建议和展望

第一,对企业家涉足于国家比较优势行业的建议并不绝对,本文讨论的是总体趋势。

第二,当企业从事其所在国家或区域比较优势行业时,往往会陷入激烈的竞争,有时甚至陷入恶性竞争而不能自拔。行业自律是必要的,温和的产业政策很可能也是必要的。

第三,有时企业从事于本国的劣势行业也会成功,而且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不过前提应该是企业自主奋斗的结果。企业的个体行为和国家的总体行为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研究总体行为为主的。有谁见过哪个国家连续近20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80%?

第四,本文所讨论问题的价值会随经济转型过程的完成而降低。

参考文献

- [1]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2]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3]大塚启二郎、刘德强、村上直树.中国的工业改革——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前景.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4]王炳才.天津经济竞争力的变动轨迹及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1,(7).
- [5]周民良.经济重心、区域差距与协调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2).

(责任编辑 彭 江)

①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